



“感恩陈先生，感恩杨先生！”10月18日上午，在南开大学纪念陈省身数学研究所建所40周年发展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墨林反复叨念这句话。陈先生即陈省身数学研究所的创始所长、国际数学大师陈省身，杨先生即陈省身创立之初设立理论物理研究室请来的杨振宁，杨振宁把时在兰州大学工作的葛墨林带到南开大学，共同投入新前沿领域的探究。“杨先生指导研究最重要的启示是，这个领域世界上谁做得最好，就请谁来做。”葛墨林深有感触，“前段时间还与杨先生联系，他脑子很清楚。我问杨先生为什么高寿依然思路清晰，杨先生说，是遗传。杨先生101岁的时候，我看他，说起我的好朋友中科院赵忠贤院士比我小5岁，杨先生说不对，比你小3岁。我回来一查，果然小3岁。”

时间稍过，中午12时许，杨振宁先生逝世的消息传来，令葛墨林心痛不已。

一生最重要的贡献

10月，与杨振宁先生紧密相关。他出生于1922年10月1日；1957年10月，杨振宁因“对宇宙不守恒定律的深刻探索以及由此带来的基本粒子领域的许多重要发现”，与李政道先生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2025年10月18日，这位科学大师生命时针停止，10月24日，生命归于大地。

凭借发现J粒子，1976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华裔科学家丁肇中说过，中国人在国际科学上建立不朽之功绩者乃自杨振宁始。杨振宁生前，当有人问“您一生最重要的贡献是什么”，他回答：“帮助中国人改变了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作用，我想我在科学工作的成就帮助中国人的自信心增加了，这个恐怕是我一生最重要的贡献。”

与杨振宁共事多年的数学家和理论物理学家费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说，科学是一项人类活动，理解它的最佳途径是理解开展这项活动的人。

尊重传统，又引领未来

“他是一位保守的革命者。和富兰克林以及华盛顿一样，他爱护过去，尽可能少摧毁它。他对西方科学的杰出学术传统和对中国祖先的杰出文化传统同样崇敬。”这番话出自费里曼·戴森。1999年5月22日，在杨振宁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荣休学术讨论会的晚宴上，戴森作了题为《保守的革命者》的演讲，刻画了杨振宁处世为人的态度、风格及特性。

在戴森称其为“保守的革命者”之前，杨振宁从没想过自己是“保守的”，后来他觉得戴森讲得很有道理，自己重视传统，通常只在必要的情况下，才会去探索新的方向。

戴森还认为，杨振宁是继爱因斯坦和狄拉克之后，20世纪物理学的卓越设计师。从当年在中国当学生到后来成为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哲人科学家，引导杨振宁思考的，一直是对他精确分析和数学形式美的热爱。

“以杨先生为例，他为什么有这么多成就，这不是某一个单一的性格造成的，也不是因为他有超人的能力，杨先生的成就反映才智和个性的结合。个性的形成是一个长期、全面的过程，和小时候受的教育、和家庭教育、社会的教育、文学的修养、艺术的修养，和人生以前多方面的发展都是联系起来的，所有这些东西加起来形成了一个人。”这是与杨振宁先后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共事过的物理学家聂华桐作出的分析。

一位“保守的革命者”，既尊重传统、尊重历史、尊重规律，但又从不守旧，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引领未来，恰恰符合杨振宁的为学与为人。

一个物理学家的品位与风格

根据杨振宁生前的说法，他对于物理学的品位大部分是1938年到1944年在昆明西南联大做学生的时候形成的。“在大学期间，我在战时的昆明遇到了吴大猷和王竹溪两位老师。他们指引我进入了物理学中的一些领域，而这些领域后来发展成了非常重要的研究方向。在这两个新生领域中的研究工作，对我的研究品位与风格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杨振宁在大学四年级时念了吴大猷教授的“论物理”课，这门课讲的是19世纪发展出来的物理学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影响到20世纪量子力学的发展。每到下课后，许多学生总是围着吴大猷热烈讨论问题。“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幕，就是在西南联大西北角的一个校门外边，有一条很长的

轻便的铁路，吴先生和我们站在那个校门外，在铁路旁边讨论物理。然后到很晚了，他看了表觉得实在是走不可了，我们就看着他顺着铁路走。”杨振宁回忆吴大猷时说。

1942年，杨振宁的学士论文《群论与多原子分子的振动》是在吴大猷的指导下完成的。王竹溪教授将杨振宁引入了统计力学领域。1944年，在王竹溪指导下，杨振宁以《超晶格统计理论研究》一文获硕士学位，由此进入统计力学研究领域，这也是20世纪物理学后半程最重要的新领域之一。

杨振宁通过在西南联大7年的学习，不只是了解了物理知识的内涵，如他自己所说，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他个人对物理科学的一种品位和偏好。他说：在创造性活动的每一个领域里，一个人的品位，加上他的能力、气质和际遇，决定了他的风格。而这种风格又进一步决定了他的贡献。

杨振宁认为，物质世界有它的结构，而一个人对这些结构的洞察力，对这些结构的某些特点的喜爱和憎恶，正是他形成自己风格的要素。因此，品位和风格之于科学研究，就像它们对文学、艺术和音乐一样至关重要。

到的良好教育(1938—1944)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

西南联大时期曾与杨家在昆明文化巷同住一院的柳无忌教授说，“在敌人侵略下，学生与教授都在后方过着流离奔波的生活，可是，民族精神依然兴旺，而‘士气’更因炮火洗礼而变得刚毅。”“战时的学生，饱尝艰辛，却没有懊丧，没有颓废。他们求学的态度是严肃的，预备学成后尽一己的力量，为国家服务。”“他们的成绩不逊于战前的学生，而意志的坚强与治学的勤健，则尤过之。”(《烽火中讲学双城记》，《柳无忌散文选——古稀话旧》，第108页、114页)

杨振宁自言，“抗战八年是艰苦困难的日子，也是我一生学习新知识最快的一段日子”。(《父亲和我》，《杨振宁选集》，第296页)他还曾说，“我们所有的人都有救亡的意识，都觉得自己民族正在生死存亡之关口。在那样一个困难的时候，我们还能够坐下来学一些学术上的东西，非常不容易。所以，大家都非常珍惜每一分钟、每一秒钟”。(《美在科学与艺术中的异同》，杨振宁、翁帆编著：《晨曦集(增订版)》，第200页)

杨振宁那时就很出名，在西南联大时就有传言说他有可能得诺贝尔奖。“当时就是，至少我是听到过。”西南联大物理学系“三剑客”之一的黄昆回忆道。黄昆视杨振宁为“非常正常的一个天才”。朋友聚谈，谈的都是学问，志趣都在学问，都在科学。西南联大整个风气就是做学问。

1945年，23岁的杨振宁就是在这样艰难的历史环境与弥漫的文化氛围中走向世界。

非常实在，又想象力丰富

杨振宁说，“我为人处世都比较简单，不复杂，就是没有很多心思。我喜欢这样的人，所以我尽量做这样子的人”。(《晨曦集(增订版)》，第321页)

与杨振宁共事多年的聂华桐曾讲述，杨先生是非常实在的一个人，他做的工作都是扎实的，他自己从来不做虚功，不做表面文章。他的工作都是有内容的，而且这些有内容的工作都是他反复慎重考虑过后做出来的，讲求实际效果，实实在在，这是他的一个性格。但通常一个非常实在的人往往容易缺乏想象力；同样的，一个想象力丰富的人又不容易很实在，可是杨振宁一方面很实在，另一方面又有十分丰富的想象力，这是他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杨振宁生前兴趣非常广泛。他对中国古典文学、中国历史，对传记和考古——中国、埃及和其他许多地方的考古都了解得很多，而且也爱好音乐、艺术和摄影。杨先生在物理方面的兴趣也是广泛的，对纯理论和实验的东西都有兴趣。这是他的一个特征。多方面的兴趣使杨振宁随时都在吸收新的东西。而与此同时，他又能够坐下来做很深入的工作，并且作出重要的贡献。

聂华桐观察到，对杨先生来说，做学问是一种乐趣，从未见到他做学问的时候感到苦恼。“十年寒窗，埋头苦读”，不是他的形象，他是顺其自然，发展自己的兴趣。杨先生随时都在观察，随时都在提问题，随时都在思索答案，这就是他能够对很多问题都有深刻了解的原因所在，成年累月积累下来，知道的东西越来越多，了解得也越来越深刻，难怪人们一跟他接触都会感到杨振宁懂得那么多，了解得那么透彻，好像什么事情比本行懂得还多！

聂华桐还提到，杨先生另外一个很突出的品质，就是诚实。他对人坦诚，不会虚假的一套，更重要的是他对自己诚实。诚实是做学问的基本要求。一个人只有对自己非常诚实，总是对自己怀有疑问，常常更正自己的见解和观点，常常老老实实去思考自己在这件事情上做得对还是错，力求抓住事情的本质，才能真的抓到事情的本质。杨先生具备这种品质。

杨振宁还有一个特点是大多数人不常有的，一方面，他非常实在，而另一方面，他的思想又非常容易受到激发，在新的物理现象面前充满激情和灵感。既能吸收别人的东西，又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和习惯，这在杨先生身上得到充分的体现。杨先生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却终生保持着谦虚好学的态度。

杨振宁说过，一个人的生命长短不应用年份来度量，而应历数其所经历的成功事业。他说自己出生在提倡“赛先生”和“德先生”的五四时代，难忘儿时从父亲口中学到的一首歌《中国男儿》：“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

这位科学大师走过了一个世纪，如今远去，令我们无比怀念！
题图①：杨振宁2004年秋摄于南开大学(刘耀辉摄)
题图②：杨振宁与葛墨林(左)1987年在南开大学的合影(南开大学供图)



作为大运河孕育的千年古镇，独流拥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独特的文化魅力。独流得名于海河水系的大清河、子牙河、南运河在此汇集，故独流古镇地理位置特殊，为水陆交通要冲，漕运发达，工商业繁荣，自古有商贾重镇和“小天津卫”之称。

因三河交汇于此，独流古镇区位优势得天独厚，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据《新五代史》及《静海县志》等史料，后晋高祖石敬瑭曾将包括独流在内的幽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为收复失地，后周显德六年(959)，世宗柴荣亲率大军北征，其先到达独流口，再逆流西进。独流地处九河下梢，始建于宋辽对峙时期，因地处交通要塞，易守难攻，宋代时设独流东寨、独流北寨，是防御辽军入侵的重要关隘。明永乐年间，独流因运河而得漕运之利，大兴屯田，形成集镇，成为贯通南北的漕运枢纽和远近闻名的水旱码头。明嘉靖年间《河间府志》有独流北寨、独流东寨等六寨的记载，愈显其重要战略地位及军事防御功能。

清初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对独流河及相关历史事件有记录：“旧《志》云：黄御河支流。自兴济县北流，经县境，又北流，入于易水，谓之独流水。《九域志》云：乾宁军北百二十里，有独流口。五代周显德六年，亲征契丹，自乾宁军御龙舟而北，至独流口，溯流西至益津关。”至清代，独流古镇是南七北六十三省通航的必经地和南北交通的咽喉，更是成为军事争夺的焦点。此时的独流镇商贾云集，人文荟萃，已逐渐发展成繁华富庶之地。咸丰年间太平军北伐，与清军在独流镇有过数次激战。清末义和团曾在独流镇设坛，抵抗帝国主义侵略。

由上，可以看出独流古镇在历代所具有的显著战略地位及其对周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

古老的运河孕育了独流古镇极具地域特色的饮食文化。明代倪敬《过独流》诗曰：“独流清晓发，高下乱帆樯。”繁忙的漕运、丰富的水系，以及发达的商业流通，使得独流老醋、曹三炳鱼、卢记火烧、炒锅巴、绿豆潮糕等众多美食佳酿应运而生，共同编织成独属于这个运河古镇的鲜明印记。在这些蕴含历史记忆的特色美馔佳肴中，最负盛名的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独流老醋。

独流老醋历史悠久，明嘉靖年间《河间府志》中有“鱼酢”和“春分酿酒配醋”习俗的记载，独流酿制的老醋当时主要作为烹调鱼虾的作料。查《天津大辞典》可见如下介绍：“独流老醋曾为宫廷贡品，与山西陈醋、镇江香醋并称为中国三大名醋。”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独流老醋被钦定为贡品，老醋坚守传统，以其特有的酿造工艺与山西陈醋、镇江香醋齐名。清光绪年间《直隶全省商务概况》也称：“天津府静海县独流醋行销天津、河南、山东……”清代是独流老醋兴盛时期，在产品远近闻名的同时，独流醋文化也慢慢成为中国食醋文化的一个缩影。明清时期著名诗人多有赞美独流老醋的诗篇，如清代李嘉绩有诗云：“傍水开雄镇，风清渤海滨。乞醯千里客，卖剑几家人。”

独流古镇自古人文荟萃，拥有丰富的历史遗存、民俗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元素共同构成鲜活的运河文化史。清代进士高恒懋曾对古镇的自然景观有过惟妙惟肖的描述：“花光水色乱晴湖，小艇轻移起浴凫。遥望烟波无限量，恍疑身入辋川图。”如今，曲径通幽的老胡同与侯氏民居、独流给水所、独流木桥等历史文化遗址遗迹见证着运河文脉的守护与焕新。泥塑、柳编、剪纸、木雕等民间传统技艺传承有序并稳步发展。在这些承载着地域记忆与人文情怀的文物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以造型设计新颖、制作技艺精湛的史记泥塑最具代表性。史记泥塑起源于清代中期，是充满传统韵味、活泼灵动的制作技艺。独流古镇多条河流交汇，为泥塑技艺的兴起和演变提供了独特的地理环境与文化内涵。数代史记泥塑艺人秉承工匠精神，勤于钻研并优化细节，持续将古典祥纹、花鸟、毛笔字等中华传统文化元素及地域特色融入作品，使其更具古典意蕴。

独流古镇慈善文化源远流长，曾创立天津乃至全国较早的民间慈善组织救火会。天津自明代筑城设卫之后，逐渐形成人杂五方的移民城市，流动人口不断增加，随着明廷疏浚河道，整修会通河和通惠河，开通运河，作为漕粮北运重要枢纽的天津因漕运而日益繁荣。至清代，河道运输极为繁忙，运河沿岸经济社会发展愈为昌盛，像独流这样的津郊水陆交通便利之地更是店铺毗连、人烟稠密，而房屋、物什毁于火灾的情况时有发生。为防范隐患及应对火灾，水会这样的民间消防组织开始出现。清代乾隆年间《天津府志》记载：“津地多火灾，延烧立同善会，出货备救火具，至今赖之。”据史料记载，平素即乐善好施、造福乡里的部分长芦盐商、贡生武廷豫于康熙初年捐款置备灭火器具，在天津创立民间救火组织同善救火会，亦称水会。在其带动下，经当地富户绅商捐房捐资，独流古镇在清代陆续成立保安、乐安、普安等多道水会。整体来看，作为在天津乃至全国成立较早的民间慈善组织，这些水会在防火御灾、恤邻安民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是中国传统慈善文化在民间切实具体的呈现。

三川汇集地，一镇映古今。新的历史起点上，具有千年文化底蕴及丰富民俗风情的独流古镇，立足大清河、子牙河、南运河三河交汇的地域优势，赓续文化传承，守护历史记忆，讲述着新时代运河新故事，持续焕发新活力。

题图摄影：记者潘立峰

满庭芳

第五
三
九
七
期

当年的北洋大学一带是“桃花夹岸红”(大学回忆片段)1925年考进北洋大学的和春芳回忆道：“校南数里长堤，有茂密的桃花林，春季桃花盛开时是津门游览胜地。从河边有两条小路通向学校的大门。进入铁栏杆大的‘桃花堤’，每届仲春，桃花缤纷，柳絮飞扬，旖旎的风光令人陶醉。明末清初诗人戴明说所作《西沽》诗中即有‘柳营村牧避，桃口晓沙迷’之描述。据传，清代乾隆皇帝下江南路过这里，曾登岸观赏，赋诗《西沽二首》。回京后又吩咐他的儿子成亲王永瑆来此一游，永瑆光临后，亦留诗一首。此后文人墨客更是不惮其远，到此饱览桃花盛景。嘉道年间诗人崔旭在《津门百咏》中描述说：“几家茅屋客东西，见说桃花夹岸红。剩有一湾流水碧，桃花依旧笑春风。”

桃花堤因1900年庚子之变，义和团首领曹福田在西沽武库大败西摩尔率领的八国联军，后武库被炸，殃及桃柳，成片林木毁于一旦。1902年，北洋大学堂迁校址于武库废墟。20世纪20年代初，经过校长冯熙运等人积极运作，在该校门口的北运河南岸的河堤上广植桃树，又展现出桃林成行、垂柳依依的宜人景象。每到课余时间，师生们便在这里散步静思，读书抒情。1918年考入北洋大学的张含英曾撰文说：“西沽桃花堤，风景宜人，是天津八景之一。沿着曲折的北运河堤岸，春日的桃红柳绿，吸引了多少游人。”(《北洋

一曰：“繁红一现便空枝，漫道寻春去迟。自是天公多狡狯，不教人见落花时。”津门篆刻家、诗人张牧石也作有西沽看桃花诗，诗中有“残红何尽，唯见梨花一株盛开”。可以说，“花堤”

“北运”和“学府”，共同构建了近现代天津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交融的一个杰作。

近年来，北洋校友返回津门，多到北运河畔的桃花堤游览流连，很多老者触景生情，激动得流下眼泪。北洋校友陈立夫常作怀念桃花堤诗曰：“名都胜迹运河东，曾共芸窗听晓钟。何事麻姑乍问沧海，桃花依旧笑春风。”2001年，在原北洋大学的北运河畔建起一座明丽自然的“北洋园”，作为北洋大学发展历程的纪念性园林，该园深具人文底蕴。现今在桃花堤上依然保留着当年北洋大学的那座“团城”。团城建于1930年左右，占地939.42平方米，通长30.7米，通宽30.6米，为中西合璧的建筑，整体似一个中式四合院，砖木结构的平房，青瓦坡顶，建筑外立面为青砖墙面，外墙上装饰有雉堞。每间屋内都有西式风格的壁炉。团城曾为北洋大学办公地，桥梁专家茅以升于1945年8月担任北洋大学校长时，就在这里办公、居住。2013年5月，团城和校内(今河北工业大学)的南楼、北楼一并被列为国家级重点保护文物。

家庭花园多真趣

程绍海

德国达姆市的建筑物，在整体造型和局部构式上有多样化特点，这是不同年代相异建筑文化和美学观点的反映与印记。所谓多样化，主要呈现为各具独特性。如一栋房龄久的楼房，一眼望去大小窗户数不胜数，但其样式却无一雷同。不用说，凭窗远眺市景之时或阳光射入窗内之际，会有一种别样的体验。就靠该项特别之处，每天都吸引不少中外旅者到此一游，摄影留念。

在多样化的建筑物中，我发现此地民居房屋普遍设置一处小型建筑：位于一楼的家庭，多附有一个小花园，或居中，或在侧，都铺植一块柔如碧毯的草坪。而每家对花园的其他经营却五花八门，自有特色。

在草坪周边，栽冠绿树木、陈列繁红盆栽者有之；挖净水小池，贮白细沙粒者有之；立巨石为山，围以猴鹿造型者有之；摆放名人雕塑头像，随时仰望、缅怀者有之；架杠木、吊皮绳，活筋骨、健身者有之；围

以桌椅，撑开伞盖，同饮、共话、赏景者有之……一派青松、翠竹植于大门两侧的园内，令我不禁想起柳宗元在《钴鉧潭西小丘记》里构园的名句“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可见中外建构自家花园的审美理念，庶几仿佛。

家庭附带的花园，上述种种别出心裁的布置和美化，对一个家庭建成和美之所干系颇大。草坪，一片绿茵如染，给人以温馨、鲜美、和谐的感受。引入遮阴树叶，扑鼻花香，令人神清气爽，精力倍增。池水漱沙，景致清绝，便于静思、长考、养心。将青山灵兽象征性地移进园内，享受大自然赋予的新鲜空气、壮阔气势、灵动活力，有利于陶冶乐观、豁达的性情。对社会进步有所贡献的人物，给人以精神的力量，时刻铭记他们是一种感恩，也是以他们的思想和事迹来鞭策自己上进求新。日常生活，除油盐酱醋茶外，闲暇时锻炼、活动身体，不亚于健身房；在一家人亲手创设的花园里促膝谈心、诉说衷肠，还有什么家庭愿景不可规划，什么家庭困难不能克服？一切烦恼都会消弭，种种称心皆将降临。

家庭花园是敞开式的，全无遮盖，有的就在边道内侧，路人有意无意都能窥见一斑。居住于二楼以上的家庭无附设花园。不过，阳台半边、居室一隅等处，无不具备开辟“微型花园”的条件。这一条件